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二卷第三、四期 1989 秋／冬季號

(實際出版於 1990 年 12 月)

市場機制與經濟發展*

瞿宛文

1.

發展經濟學在近年來因少有發展而越來越不受重視，但 Amsden 這本書(Amsden, 1989)則被人認為不單非常有趣並且給發展經濟學注入一些活力，主要是作者雖是一經濟學者但跳出一般新古典的靜態分析，而且不限於經濟學的範圍，做了動態的、較全面性的及歷史性的分析。

Amsden 首先將發展的模式做了一個分類，即(1)英國的工業革命，(2)美國與德國的第二次工業革命，(3)到二十世紀才工業化的後來

* 本文是對 A.Amsden,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一書的評述。作者感謝柯志明、謝國雄、吳乃德、董安琪，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的師生及兩位評審對初稿提出的修正意見。

者。主要的差別是在於(1)的關鍵是技術的革命(invention)，而(2)的關鍵是技術的創新(innovation)，而(3)則是全靠學習(learning)沒有什麼技術上的優勢。優勢何在的問題牽涉到其他的方面，即後來者以什麼做憑據來趕上先進國。Amsden 認為後來者必須憑據國家機器的強力支持，並用補貼企業的方法來將價格扭曲成對發展有利的情況，而政府也必須“強”到能規範企業，使企業先是靠這種補貼，然後在其庇蔭下努力學習以至到後來就不需要補貼了。而學習主要是在生產技術上的學習，所以焦點是在生產場所上(shopfloor)。

新古典經濟學者對落後國家為何不能發展所提出的解釋，多半是零星的，如人口太多、儲蓄不足，甚至各種文化因素等等，但這些皆是陷於落後的整個惡性循環的一環而已。那要如何打破這個循環？如何開始成長？他們多半會說要尊重市場機能，要遵循市場的價格規律，要政府盡量的自由化，各個國家都可遵循它的比較利益來發展適合自己的工業，來加入國際分工，以此來成長。

近來亞洲的所謂新興工業化國家(NICs)的興起，被很多新古典經濟學者（如 Balassa, 1981 等）用來做為支持他們理論的依據，意即這些國家在他們眼中是採取了追隨自由市場的政策，並且依據各自的比較利益加入了國際市場，所以 NICs 的成長記錄被他們引用來證明市場機能成功的例子。但如果這政策這麼有效，為什麼其他的落後國家不會跟隨 NICs 的後塵，就不在他們討論的範圍了。也就是說他們所提出的解釋並不完整，對於落後國家為何繼續落後無法解釋，但這並不會阻止他們繼續堅持市場機能是克服經濟落後的唯一方法，並且繼續忽略對他們不利的証據，只看有利的例證，也難怪發展經濟學日漸失去它的吸引力。

Amsden 極力反對上述的說法，認為南韓絕不是依賴自由化下的市場機能發展起來的，她提出兩個論點：(a)落後國家為何繼續落後是因為制度性的因素，即它們缺乏一有力的國家機器來帶領經濟走出困境；(b)市場機能或自由化不是發展的靈丹，即落後國家需要政府大力

的補助與強力的領導，即需要政府來扭曲市場價格以便企業能夠成長。在這本書中，她就是用了南韓的發展歷史作為例證來證明這些論點。簡言之，她認為南韓為何能在近年來快速發展，是因為社會結構的改變使得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成為可能，並且南韓的發展不是仰賴自由化的政策，而是靠政府的補助與扭曲市場價格來領導企業界的成長。

Amsden 的論點並不完全是新的，很早就有經濟史學家 Gerschenkron (1962) 指出，當落後國家的各種經濟成長之事先的必要條件(如資本供給、技術勞工、企業家精神、技術能力等因素) 不存在時，是會(也是必須)有些制度上的代替品出現，如政府干預等。不過 Gerschenkron 對於政府為什麼會或不會做這些事，即社會內部的結構問題並沒有做太多討論，而這正是 Amsden 與他不同之處。另外，與 Gerschenkron 同時，也有包括依賴理論在內的學說，對正統新古典經濟學以及其相關的現代化學說提出挑戰，指責其完全忽略制度性的因素。更何況大多數的落後國家的繼續落後，甚至更加落後，仍是正統派無法解釋的現象。不過 Amsden 的貢獻在於她整理了這些看法，並且用南韓的例子，來驗證以上的論述，提出一個完整的說法，並且對一些新古典經濟學者對 NICs 興起的解釋提出了詳細而有力的挑戰。

本書主要分成三個部分，作者主要的全面性論點是在第一部分的第一至第六章中所討論的，後面兩個部分則是對於第一部分的說法提出較個體性的研究來支持第一部分所述的理論。第二部分的第七至第九章是討論人力資源，討論了工程師兼經理人員、實質工資上漲的原因、教育等。第三部分則主要是由個案去看動態比較利益的變化，包括了對第一代出口產業、現代重工造船廠、浦項鋼鐵公司等個案研究，在最後一章 Amsden 還由此導出些對美國這種競爭力在衰退中的先進國如何重振的教訓。

2.

作者認為既然落後國家的工業化與經濟成長必須要由一個有力的政府領導，多數落後國家的遲遲不發展也就是因為社會結構使得它無法產生一個有力的政府。也就是說作者是贊成制度性的因素是工業化與否的關鍵所在。除了制度性因素之外，主要的說法就是市場機能論。雖然有人也提出自然資源與人口作為解釋，但其解釋力很微弱。日本的自然資源很少，很多落後國家的資源則很豐富，這難道表示資源的多寡與發展難易成反比例？至於人口因素，已有太多研究證明人口的多寡是發展程度的結果，而不是原因。台灣就是很好的例子，台灣的人口成長率從 1953 年的 3.8% 一直隨著經濟成長而降到 1989 年的 1.0%。也就是說台灣早期的高人口成長率並沒有對工業化有何妨礙，兩者並存的。也只有當工業化之後，當人們的所得增加之後，人口成長率才會開始下降。而至於市場學說，就如上節所述，無論市場機能是否是發展的唯一方法，這學說本身沒有解釋為何落後國家不採用這種藥方來工業化，即不能解釋落後的繼續存在。

至於社會中為何會或不會有較強的政府出現，所牽涉的因素就相當複雜了。並且要能成功的工業化，所須要的不只是強的政府，而且要一個強的、具發展取向的政府(a developmental state)，並且是能規範企業和政府。發展取向(Developmentalism)的興起更是不容易解釋的現象。

就南韓的例子而言，日本的殖民統治對殖民地的社會結構有很大的影響。它的統治確實去除了一些封建的制度，如廢除奴隸制、建立了民法，奠立了現代化的基礎，如做了一些金融、交通、商業等方面的基本建設等等。但同時，其統治也產生了新的問題，新的未來發展上的障礙，也就是說殖民統治仍然相當程度的扭曲了當地的社會結構。譬如說教育制度上不讓韓國人進入技術與管理層面；在有限的工商業發展中，主要是日本的資本，韓人資本到 1938 年也只占總資本的

12%；農業雖然依照日本模式改革，但因沒有多少工業所以多餘人口沒有出路，以至農村生活非常困苦，人口的流離非常嚴重。簡言之，殖民者所留下來的是一個支離破碎的社會結構，也因此容易受到列強宰制，就如後來所發生的一般。

南韓戰後的歷史不在此詳述，但就 Amsden 的論點而言，重要的是在那過程中，因為各種因素，在 1960 年以後，南韓出現了一個強勢的軍事政府，並且是具強烈發展取向的政府。簡言之，這是因為殖民統治所留下來的社會結構中，多數的階級力量都相當微弱，美國因北韓已實行土地改革，也在南韓推行土地改革。這也使得那時社會中力量可能最大的階級——地主——變得軟弱無力。同時社會上其他的階級也都不強，如商人與企業主數目仍非常少，勞工也是為數不多並且完全沒有組織，農業部門中，大地主已不存在，多數都是小農，力量分散且毫無組織。

在 1950 年代中，經過韓戰與美國的大力扶持，南韓的軍隊從幾乎為零，成長到六十萬大軍，而成爲社會上一股最強大的勢力。工業與商業的勢力也在依賴美援的情況下有些成長，但多半是依據政治影響力而不是靠市場競爭力來賺錢。到了 1960 年代初期，軍人政變奪取了政權，就社會勢力的發展來說也是很自然的了。但爲何這個軍事政權會非常具有發展取向，因而強力領導社會走向經濟發展的道路，原因則比較複雜。一方面是因為有這種條件，即社會其他勢力相對於軍人來說是很薄弱，因此軍事政府有這種條件來做強勢領導；另一方面則是因爲歷史的發展，美國顧問的意見雖有相當的影響但應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就實際作法而言，這軍事政權是在摸索的過程中找出這條道路來的。也就是說它是在必須求生存的掙扎過程中走上這條路的。Amsden 在書中雖然對於每一次重要的政策變化的發生原因有所討論，但是並不是很完整，說服力仍嫌不足。這裡還有動力的問題作者沒有解釋清楚，也就是說，即使有這些條件，並不表示它一定要那樣做，換句話說，爲何這政權要如此的努力來推動這些事情並不是自明

的。

事實上，這個問題是非常重要的。即在何種情況下會有南韓的發展產生。這必然是一個歷史的發展過程，必須由歷史性的探討來著手。Amsden 在書中所作的確實是畫出了一個輪廓，但是仍需更詳細的研究來證實她所提出的說法確實站得住腳。其實 Amsden 在整本書中主要也是對南韓的發展做了相當深入的研究，並對其發展提出解釋，但既然所涵蓋的範圍很廣，其所提出的一些說法也難免顯得證據不足或需進一步探討來證實。不過她所提出的一些看法確實是新穎有趣的。

3.

Amsden 認為第一及第二種工業革命是和技術優勢有關，但第三種則和以前都不一樣，是靠學習。那這就牽涉到學習者(第三種)是靠何種優勢來作為其發展工業的基礎。是低工資嗎？關於這點 Amsden 有點語焉不詳。一方面她說在這以前低工資是從未成為發展的基礎，即在以前美國和德國在要追上英國時，工資並不比英國的低，而顯然南韓的工資是很低的，也就是說低工資在這次終於成了發展的基礎？但是在後來的討論中她又明顯的說低工資並不是一個優點，並且也引用其他研究來證明在 1961 年左右南韓的工資雖低，但因生產力低，所以單位勞動成本其實較高，因此顯然不能成為發展工業的基礎。關於這點，Amsden 始終沒有作很好的澄清。

那工業化的基礎何在？她認為是政府的各種補貼。也就是說落後國因生產力低，技術落後，就生產工業品而言在成本面上是毫無優勢，因此要開始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必須先靠補貼。而南韓的成功在於它的工業能在這過程中，產生質的變化，即生產力進步以至終能不靠補貼而自立於國際市場中。補貼既然成為能否工業化的關鍵，這就和前面需要強勢政府的說法相呼應了。

Amsden 對 1960 年代軍政府所提供的各種主要對出口的補貼作

描述時，也同時對自由化的有效性提出反駁。針對有些經濟學家認為自由化是幫助了南韓的發展這種說法，她提出說在那時南韓政府根本沒有真正的自由化，雖然它曾對利率與匯率做過一些改革，但因為對出口廠商在利率與匯率上的選擇性補貼繼續大量存在，因此實在談不上有何真正的自由化，並且也沒有什麼效果，更談不上是南韓工業發展的基礎。

但補貼與保護並不是很難做到的，也就是說不是南韓特有的。所特別的是這軍政府在給予補貼時，也有能力對被補貼者加以約束與規範(discipline)，意即它對企業能依據其表現而給予獎懲，因而能促使企業進步，提高效率，免於墮入易伴隨補貼而來的怠惰因循。Amsden在另一篇文章中(Amsden, 1990)更清楚的提到，南韓情況的特殊之處在於能依發展取向規範資本，而不在於其能管住勞工。管住勞工雖對累積也很有幫助，但並不特殊，很多國家都有這種情況，但能規範企業則不單是特殊少見，並且也是這種發展方式能夠成功的關鍵。至於為何會有這種能力產生，則是和前面社會結構的討論有關。

Amsden 花了不少篇幅來描述南韓政府在整個過程中所擔任的角色。它不單是設法規範企業，更重要的是，它在發展初期擔任了企業家(entrepreneur)的角色。它不直接管中小企業，而著重大企業，並替依靠它起家的財閥(chaebol)作投資上的決定。而所投資的領域則是在當時並不賺錢的較資本密集的產業。隨著時間的過去，大企業在決定過程中的參與日漸增加。而產業之投資報酬率的結構也起了變化，即重工業的利潤率漸漸趕上輕工業的利潤率。

曾有很多經濟學者批評南韓政府的這種作法。他們認為財閥借貸的利率因受政府補貼而太低，不能正確反應資本的成本，因而扭曲資源的運用；同時這些資本被用在資本密集的產業，不符合南韓的比較利益。總之，他們認為這些資本沒有被有效率地運用。經濟效率在新古典經濟學中是一非常重要的觀念，而確實在剛開始的時候，南韓的資本運用形態是不符合經濟效率之準則的。但是，經濟效率是一個靜

態的觀念，而發展或工業化則是一個非常動態的過程，並且工業化正是要將原先的狀態改變過來。因此，為什麼要將初期落後狀態時的條件當作既定，而根據那時候的靜態經濟效率來作為投資的依據？重要的應該不是那時候靜態的經濟效率準則是否被遵守，而是事後生產力有無提高因而改變了當初的落後狀況。

也有人提出發展的階段論，即落後國家應追隨它自己的比較利益來發展。而隨著經濟的成長，落後國家就會發現其比較利益在改變，在國際比較利益的階梯上往上爬。所以任何時候都沒有理由偏離靜態經濟效率以及比較利益的原則。譬如說像南韓原來輸出勞力密集的產品，有成長後就開始輸出較資本密集的產品。

對於這種發展階段論以及比較利益階梯論，Amsden 提出幾方面的反駁。首先，她認為這些理論只是在描述一些現象而沒有提出解釋，沒有對落後國如何能從一個階段跨越到下個階段的機制做任何交代。在實際上，還沒有一個落後國家是以上述這種方式而發展起來的。Amsden 的整本書就是在證明南韓不是這樣發展起來的。像南韓這種情形，雖然在某些表像上和上述理論有相符之處，譬如說其輸出品構成是有那樣的變化，但這只是現象，並且有很多理論能解釋它，包括 Amsden 在書中所提出的。

Amsden 花了不少篇幅從個體面來討論這問題。她發現在南韓發展初期時的領導部門——即棉紡織業——和後來的領導部門中間是不連續的。即後來的領導部門中的企業是來自初期的進口代替產業，而不是來自棉紡織業的擴散，即棉紡織業所培育出來的資本與企業家並沒有在後來的資本密集部門中扮演任何角色。因此雖然在表面上第二個階段——即資本密集的產業比重大幅增加——是出現了，但並不是因為如階段論所說地自然而然的連續過程，而是原先在早期違反經濟效率所作的進口代替的努力成功所導致的結果。Amsden 也強調早期進口代替的重要性，因其讓企業學習用資本密集的技術以及現代化的經營組織。

Amsden 也挑戰另一個普遍被接受的理論，即現在國際組織，如 IMF 和世界銀行等，都認為要安定才能成長，所以到處要求欠它錢的落後國家要採用它所建議的緊縮措施(austerity measure)，減少財政與貿易赤字，穩定經濟然後才能成長。但 Amsden 認為南韓政府所作的剛好相反，即它遇到危機時，是借錢來維持成長，而因為成長被保持，所以以後還錢也不是問題。因此 Amsden 認為教訓是成長先於安定，並且也只有成長才能維持安定，不只是經濟上的安定，而且也是社會上的安定。

4.

現在一般的傳統成長模型是將成長率當做是生產因素的函數，或是技術變化的函數。這樣的模型就將技術變化當作是外生的，而不能解釋技術變化本身。並且這也只是在已開發國家較適合，即因果關係是由技術變化到生產力的進步到生產的成長。而在像南韓這種落後國家，技術完全是靠學習的，談不上技術創新，因此生產力的進步是看能多快的學習好外國科技，而能越快成長就能越快學習科技。因此 Amsden 提出的成長模型是生產力進步與產量成長互為因果，重要的是一旦開始成長了，成長會有它自己的動力(momentum)。因此更突顯了政府維持成長的重要性。

但是產量的成長不一定能帶來生產力的成長，不一定意味最新的科技會被有效的吸納採用。重要的是在生產單位中要發生質的變化，即生產單位會努力並成功的吸收、學習新科技而改進生產力。而這就牽涉到生產單位內的變化。Amsden 雖然並沒有清楚說明，但若從其邏輯推想，這種成功牽涉到多種因素的配合，最主要的、最早的推動力當然是來自政府。而它對企業所給予的領導與規範，是迫使企業進步的主因。但同時配合的因素是在企業界也產生了企業組織上的變革，使得生產單位能達成生產力進步的任務。

財閥是南韓發展最主要的組織形態。如前所述，它們是在政府又

獎又懲的扶持下茁壯的。它們在早期的投資決定主要是由政府來做的，但後來自主權日漸增加。它們的組織及運作方式是由現實環境的需要來決定的。南韓的財閥經營非常多角化，並且是由一個家族緊緊的控制。所以在形態上，比較不像美國的多部門的現代大公司，而較類似日本早期的財閥(zaibatsu)。這種形式是因為它們不掌握什麼技術優勢，不像美國大公司是靠掌握某種產業的特殊技術及市場知識而為其優勢。就生產實力而言，南韓財閥這種組織形式的優勢是在它們累積了用整個財團整體的力量進入新的產業領域的經驗，而對於南韓這種沒有技術優勢又必須進入很多新的領域的情況，這種組織是應需要而生的。至於其他關於大財團組織形式的優勢及缺點，則是和一般的討論差不多，即是優劣互見。不過對於投資決定的影響是特別值得注意的。

另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社會是否能對財閥的力量加以限制。在初期政府的力量較大，能規範財閥，並且政府也促使各財閥之間有相當的競爭。但財閥漸漸長大，政府的規範能力漸漸減弱，社會上與其對抗的力量何在？到了1980年代，Amsden認為南韓政府試著用自由化來約束財閥的力量，自由化主要是在貿易與金融方面。但事與願違，在國內金融市場自由化的過程中，財閥是最有運作能力的，因此自由化使得壟斷程度更高而不是減低。在這點上，南韓政府的意圖是否是如Amsden所說的，不是很清楚。而隨著經濟的成長以及財閥力量的茁壯，政府的自主性是在減弱嗎？相對於財閥，社會上的制衡力量將來自何處？南韓政府是否能像以往一樣對企業有相當的約束力？這對以後的經濟發展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對於這些，Amsden沒有進一步的說明。

5.

因為沒有技術的優勢，因為必須快速學習外來技術，所以南韓財閥的經營重點是放在生產場所，並且其生產關係也有特定的模式。一

方面在經營權的分配上，策略性的及財務性的決定是由財閥家族或其家長所決定，而其他生產性的決定則是相當分權的。大量專業工程師出身的經理人員因此成爲經營層的中堅。他們因初期對外來技術的不熟悉，因此必須親身在生產場所，對生產過程有很大的參與。同時也因爲如此，所以必須讓工人對生產過程有相當的參與。

軍政府除了一貫（用警察與情報局 KCIA）壓抑勞工的作法外，並沒有什麼長期的維護勞資關係的策略。雖然勞工一直被壓抑，勞力供給並不緊，工會向來也沒有什麼力量，但是南韓的實質工資有快速的成長，1955-80 年間，約成長了 4.4 倍。Amsden 所提出的解釋是說，因爲這些企業必須在經營者也不太懂技術的情況下，來快速學習外來科技，所以必須付給工人高工資來誘使他們努力學習。不過實質工資的成長仍落後於生產力的進步，而快速的成長也使得工資能長期的持續地成長。Amsden 也討論了階層化、性別隔離、長工時及農業生產力進步等因素的影響。

不過，現在大家已習於不以這種到此爲止的分析爲滿足，很多人會問，勞工那邊的故事是什麼，他們曾抗拒這些這些變化嗎？也就是說，勞工在整個過程中是否只是被動的反應，還是資方是因應於他們的反應而採取了上述的措施？在這些問題不甚明瞭之前，Amsden 對工資爲何上升的解釋就不是很有說服力了。

Amsden 在最後一部分中就造船業與鋼鐵業，作了個案分析討論，希望以此來證實以上較一般性的討論。造船業的故事是相當戲劇性的，現代重工(HHI)在 1973 年才開始造第一艘船，但到了 1984 年則成了世界最大的造船公司。南韓財閥的衝勁令人驚訝，但是近年來在造船業整個國際市場不景氣下虧損連連，最後結局尙未可知。鋼鐵業的故事稍有不同。南韓最大的浦項鋼鐵公司(POSCO)竟然是由南韓政府所創辦主持的。從 1968 年開始成立，請日本來幫忙建廠，1973 年開始運作，到現在已經成爲世界上最低成本的製造商之一，顯示了它學習速度的快捷。一個公營的公司能有這樣的成就，表示了所有權和企

業表現之間的關連並不是那麼單純或線性化的。

6.

如何解釋所謂的 NICs 的興起是現在發展領域中一個相當重要的課題。Amsden 在書中主要的貢獻，是對於南韓的實例作了相當詳盡的研究，並用它來對於所謂的 NICs 的興起提出一套新穎的解釋，並且用這套解釋來挑戰現在主流的說法，即新古典經濟學者所提出的市場機能論的解釋，這是本書的重點，也是它最主要的貢獻。

同時，書出版之後 Amsden 也撰文用書中的論證來挑戰另一派的說法(Amsden, 1990)，即一位調節學派(regulation school)的學者提出的，和依賴理論類似的，用中心(center)在“調節”上的需要來解釋邊陲(periphery)之發展的說法。Amsden 很顯然認為南韓的發展雖然受到外來的影響，但是仍必須要由邊陲自己內部各方面的歷史發展與社會結構的變化來看才能有解釋力。Amsden 對上述兩個說法所提出的挑戰是相當有力的，雖說她自己的說法也仍有許多有待更詳細說明之處，但她所提出的觀點與看問題的角度，就這問題而言是比其他兩種說法更有解釋力的。

不過，Amsden 沒有對於當時的國際經濟環境做進一步的分析也是一個缺憾。雖然由中心的需要不一定能解釋邊陲的發展，但是既然在南韓這情況下，邊陲的發展在開始時是靠外銷輕工業產品到國際市場，尤其是先進國家的市場去，那這種市場需求的存在與否是很重要的。Harris(1989)就提出了這樣的看法，他認為若看過去的歷史，會發現二次大戰後，國際經濟環境有相當的變革，在戰後先進國中會出現這種對於勞力密集工業品的需求是有其特定歷史條件的，是前所未有的現象，並且當時自由貿易相當通行。是這種外在條件的出現使得南韓這種發展模式有實現的可能。對於這種機會的出現，各個落後國家依據它的條件會有不同的反應，因此會有不同的發展，Amsden 所提出的說法就能解釋在這層次上不同落後國為何會有不同的反應，但是

若當時國際環境沒有這種空間，那南韓的故事必會相當不同。所以在這整個故事中，南韓的發展確實是有很多歷史的機緣在裡面。

Amsden 在這裡並沒有提出發展方面的全新大理論，她雖然一直強調她自己所提出的三種工業革命的分類方法，並且一直著重落後國如南韓是一“學習者”的重要性，這說法雖有新意，但也不是革命性的觀念。落後者在追趕時必須有何種社會制度，是從 Gerschenkron 就開始有很多討論的。Amsden 在這方面的分類與說法雖有新意，但是與前人有類似之處。Gerschenkron 的論點中並沒有討論到落後國家為何會產生這些必要的社會制度，以便能趕上先進國，其他的學說在這方面也很少討論，而 Amsden 確實是作了必要的論述，但並不充分，也不是本書的主要部份。這方面仍需要更多的研究。

同時作者有時太強調“學習”以及其所意味著的“必要的”制度上、組織上、勞資關係上的變革，在有些地方有點技術決定論的嫌疑，並且和她在總體面的討論衝突。即她在總體面的討論中認為南韓的發展是有其歷史發展以及社會結構的因素，但在個體面却忽略了這方面的討論，以至於在強調南韓在各方面的變革是如何能幫助南韓在學習上的需要時，她的論點就容易成為技術決定論的說法，意即因為發展及學習的需要就自然會有這些人的制度上及組織上的變革。不過因為現在經濟學中的討論已太容易將美國等已開發國家的情況當作唯一可能，所以 Amsden 的討論與一些區分作為針對現在流行說法的檢討，也是有意義的。

Amsden 雖然對新古典經濟學的許多說法提出有力的挑戰，不過對於南韓的“對外傾向”或“出口傾向”在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却沒有評估。譬如說，南韓政府是相當成功的規範了企業，使其不會因有補貼保護而怠惰，在這裡，用來作評判依據的表現準則是一較客觀的準則，即輸出到國際市場的成績，但這是否是一重要的因素，Amsden 並沒有討論。南韓是工業化了，但是它不是以國內市場為主發展起來的，這在它以後的發展中會有什麼樣的影響？Amsden 對此

並沒有提出她的看法。

我們讀這本書，一方面是將它放在發展經濟學的領域中，看它對這方面的貢獻，但同時也是因為台灣與南韓的發展途徑有太多相似之處，所以會要比較這兩個地方的異同，就這方面來說，這本書是很值得參考的。台灣若與南韓比較，大方面很類似，如日本殖民統治的影響、土地改革、美國在政治軍事上的介入與經濟上的援助、具發展取向的政府在早期的主導角色、以補貼保護來推動出口導向的發展等方面都很相似。

不過，不同之處或許更值得注意與思考：在政府與社會各階級的關係上，以及與這問題相關的財閥之角色等。除此之外，在台灣的大企業，不論公營私營，主要不是直接外銷，而是以供給外銷的中小企業或以國內市場為主，而不像南韓的 chaebol 有相當比例直接外銷。這些差別有何意義？是否表示它會因不受國際市場的競爭壓力而較怠惰？這對台灣整體經濟的影響是什麼？這些都是尚待研究的重要問題。不過，至少在 1980 年代當台灣的投資幾近零成長時，南韓的投資則仍然繼續成長，既然投資決定對未來成長非常重要，那麼，在 80 年代投資方面不同的表現應有其顯著的意義，是什麼因素導致了這樣的差異便非常值得探討了。

同時台灣在這些方面是否有隨著時間而變化的現象，也是值得注意的，即政黨與財閥的角色比例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政府的自主性在減弱嗎？社會上的制衡力量將來自何處？台灣的自由化，即民營化，會像南韓的情況一樣使得壟斷程度更高而不是減低嗎？這些對整體的投資與成長又會有什麼意義？這些問題都很值得進一步探討。

雖然我們不能要求一本書能涵蓋發展所有的層面，但也仍要指出此書主要是著重在解釋工業化為何能夠在那個時候在南韓發生，但並沒有包括一些相當重要的討論，譬如說對於工業化的社會影響，人們的實質生活水準，勞動的條件，環境的破壞以及其對人的生活品質、企業再生產的條件的影響等，書中都沒有做什麼討論。也有人會說因

其沒有探討勞工對資本的反應與互動，所以即使其對工業化的解釋也是不完整的。

雖然 Amsden 無意要將對工業化為何發生的解釋當作是對南韓政府表現的歌頌，或是對“強”的政府的歌頌，(儘管 Amsden 也強調說很多“強”的政府並不具有發展取向)，但難免會有人將它的研究結果解釋成如此。在任何情況下會出現各取所需的解釋是無法避免的。不過這一方面可能是因落後國無論是以那一種方式工業化，在過程中爲了要追趕(catch up)，是需要有組織地努力的。另一方面則也可能是因爲 Amsden 沒有討論上段中所提的那些工業化的其他層面所致。

總之，此書對於作爲 NICs 之一的南韓爲何會有今天的發展，提出了很有新意的解釋，也對相關的說法提出有力的挑戰，尤其是對現在經濟學的主流所提倡的市場機能論提出了挑戰。雖然 Amsden 的說法在有些地方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被證實，並且若作爲一個全面性的解釋，則所涵蓋的面不夠廣，但它若能引發更進一步的研究，則會是很值得令人期待的發展。

參考書目

- Amsden, Alice H. (1989)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msden, Alice H. (1990) "Third World Industrialization: 'Global Fordism' or a New Model?", *New Left Review*, 182, pp.5-31.
- Balassa, Bela(ed.) (1981) *The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Pergamon.
- Gerschenkron, A. (1962)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rris, Nigel, (1989) "The Key to Korean Development: Economic Nationalism or World Econom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Conditions and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UCLA, Center for Social Theory and Comparative History.